

## 編輯室報告

今年值逢日本明治維新一百五十週年，故本期徵稿以此為專題，發出徵稿啟事，徵稿內容摘取部分內容如下：

1868 年當日本明治維新第一功臣西鄉隆盛帶領 17 歲的明治天皇兵不血刃地入江戶城的當下，不僅決定日本近代的命運，同時也波及東亞乃至世界的命運。明治政府長達 45 年（1868-1912），將近半世紀的年代，復古與趨新並進，一方面推崇尊皇主義，成為全日本的精神信仰，一方面積極學習西方文明，一步步邁入近代西方帝國主義的行列。近半世紀裡，明治政府在經濟上全面推動國家近代化的殖產興業政策，促進產業及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政策推動上，也經歷過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更有過短暫的內戰，如東北的戊辰戰爭（1868 年）、西南戰爭（1877 年）等；在精神思想的控制政策有廢佛毀釋運動，恢復神祇官制度（後改為神祇省，又改為教部省），倡導「國學」。在推動國政、軍政與教育政策思想的統一上，如頒布〈軍人勅諭〉（1882 年）、〈大日本帝國憲法〉（1889 年）、〈教育勅語〉（1890 年）等。以上所有政策的統一推動，都在 30 年內逐步完成，當是時中國與朝鮮內憂外患，飽受西方帝國主義侵擾，而日本已經脫胎轉換，脫亞入歐。之後明治中後期，打贏了甲午戰爭（1894 年）與日俄戰爭（1905 年），這是自古以來日本從未有的盛世。只是，歷史扉頁快速翻動，日本快速膨脹的帝國，不僅為他將來付出極大的代價，也給東亞區域帶來綿延的戰禍。放大歷史視野來看，明治維新真的成功嗎？如果成功，為何這種成功會給日後的人帶來巨大無窮的苦難戰爭呢？如果成功，為何這種成功是以犧牲人權來成就國權或神權呢？如果成功，為何在未來的 30 年的日本換來兩顆原子彈的慘劇呢？這之間有太多值得令人省思的地方。

因此，本次專刊的兩篇論文，簡曉花的〈跨世紀的新透視：再論被馴化的明治國家意識型態下的日本基督教徒兩大類型〉以及林以衡的〈維新造英雄：日治臺灣文人謝雪漁小說〈三世英雄傳〉中的文明想像與國族書寫〉。簡曉花論文中是根據其長年鑽研的基督教與武士道課題，扣緊「被馴化的明治國家意識形態」之洞見觀察，從過去已研究過的基督徒松村介石，到本刊論文處理內村鑑三及新渡戶稻造這二位享譽國際的基督徒面對「國家意識形態」之態度，作者敏銳地比較他們之間對神道批判的間接態度，不論在神道的解釋上，還是神人之間的距離態度上，作者得出新渡戶稻造比起內村鑑三有更肯定國家主義的傾向。這篇論文讓我們看到明治維新後，以天皇信仰為主的國家意識形態，如何地馴化了基督教徒。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飛躍發展，1895 年甲午戰爭後，臺灣割讓給日本，當時臺灣從初期的武裝抗日失敗後，進入到平和的左派議會請願運動，持續抗議日本的殖民統治。但也因日本殖民教育日漸奏效，出現依附殖民政權、肯定殖民統治的文人，在面對身分認同與政治認同的拉拔過程中，表現迎合日本，但也希冀中日合作的大東亞共榮願景，林以衡的論文處理謝雪漁小說〈三世英雄傳〉正是探討這個歌頌明治維新所出現的作品。該小說是藉著先祖隨著徐福由中國

渡海至日本、開始數代新生活的「徐士奇」一家為主線展開，文中「三世」既可指徐士奇一家三世的經歷，也可指作者本文中經歷過「幕末」、「維新」與「殖民」，林以衡藉著「文明想像」來分析小說中的「英雄」都是肯定維新的文明與進步，也對殖民者高度肯定，無視於殖民統治的陷阱；也藉著「國族書寫」這個敘述，分析小說主角完全將自己中國的血緣融入到日本，極力扭轉自己原有的中國人身分，可以毫無衝突地融入到日本人的身分認同，既為維新賣命，也肯認「大和魂」。林以衡此文所分析的謝雪漁，與簡曉花所分析那些日本基督徒們，都是在「被馴化的明治國家意識形態」下所產生的無奈或扭曲，不論是日本人或是被殖民的臺灣人，在強大的國家意識形態脅迫下，有人無奈地用曲折方式進行無言的抗議，但也有人直接加入國家暴力行列，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共犯，至今仍值得令人省思。

本專刊最初來稿共有 6 篇，但因審查嚴格，最後審查委員決定這期出刊的兩篇論文，其他不錯的投稿論文也只能割愛。

本刊另一篇林倩君所著〈找回失去的亞特蘭提斯：從德國晚期浪漫主義小說《金罐》溯源「魔幻寫實」書寫〉，係從文學史的角度，分析十九世紀初德國晚期浪漫主義代表霍夫曼（E. T. A. Hoffmann）具有「魔幻寫實」的開拓性文學創作作品。本文追溯並澄清「魔幻寫實」（Magischer Realismus）這個概念與經典作品須從霍夫曼的《金罐》這本小說談起，並分析「魔幻」的想像情境如何透過「寫實」地「大膽地進入現實生活中」，改變了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所追求之脫離現實的幻想和內在自我的情結。本文若拿來與前面專號主題有關明治維新的「國家意識形態」連結想像的話，剛好形成反面的對比。鼓吹「國家意識形態」者，用失去純真而看似成熟的手法，強迫百姓進行千篇一律的「魔幻」想像，想像一個天孫民族的共同體，並進入現實人民生活中，壓迫著人民必須過著單一的思想與習慣。但霍夫曼的「魔幻寫實」卻是一部回到童年的純真，希冀一種多元可能的想像，並落實在現實生活的開放中，藉以平衡現實的殘酷世界與理想的世界。

走過明治維新一百五十週年，回顧當年國家愈富強，卻愈走上自我膨脹而不可自拔的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擴張之路，結果害人也害己，印證近代戰爭的泉源正是與操弄近代「國家」、「民族」的權威象徵與建構莫須有的「神話事實」息息相關，二戰前的日本如此，德國也是如此。這不禁讓我們省思，所謂「國家」或「民族」正是罪惡的根源之一，昔日革命家章炳麟即很有洞見地觀察到這一點，當年他參與革命時，便碰觸到「國家」建構的危險性，特說：「一、國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實有者。二、國家之作用，是勢不得已而設之者，非理所當然而設之者。三、國家之事業，是最鄙賤者，非最神聖者。」<sup>1</sup>值此明治維新一百五十週年，特以此專刊紀念與省思。

《師大學報》第 63 卷特約主編 張崑將 謹誌

---

<sup>1</sup>章炳麟，《太炎文錄初編》，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484。